

中国崛起与国家统一 的外部环境

[内容提要] 中国崛起为完全统一的现代化强国,可以分解为实现完全现代化和完成国家完全统一两大目标。我们面临着中国崛起与国家统一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中国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发展状况及其结果。一方面我们应该把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放在首位,也应该将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放到自己力量的基点上;另一方面我们应该在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善处自己崛起的国际政治后果。从现在起,中国应该制定出适当的国家崛起战略和国家统一战略,并使二者具有良性的“必要的张力”和互动关系。

[关键词] 中国崛起 现代化 国家统一 外部环境

中图分类号: D82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7-1369(2006)5-0001-05

中国崛起,即中国成为经济高度发达、政治体制效能优越和国家完全统一的现代化强国,无疑是近现代以来中华民族追求的首要目标,也是近现代以来中国社会的主题。根据中国近现代历史的进程特征,其中又可分为实现完全现代化和完成国家完全统一两大分解性目标或分解性主题。这两大目标和主题相辅相成,互为条件。由于中国在迈入现代化过程的开局,即接连遭受外国列强的侵略和欺压,所以,这两大目标和主题曾出现过错位现象,学者们曾将之称为“双重的主题变奏”。自19世纪末20世纪初,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内,救亡一度压倒了现代化,维护国家主权和国家统一的任务显得比实现现代化来得更为迫切。从日俄战争(它侵犯了中国的部分领土)、中日甲午战争到抗日战争,中国投入了相当大的国家力量和资源来对外御辱。冷战时期,中国亦受到来自两个超级大国的政治压力,维护国家主权和反

对外部势力分化中国成为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加之国内政治的原因,现代化的步伐在一定程度上放缓。就此而言,中国自身所面临的两大目标和主题始终受到外部环境的影响和制约。只有到了20世纪80年代,中国才开始真正具备了解决两大目标和主题关系的充分的内在条件与外部环境。自中国共产党十一届三中全会后,现代化建设成为国家的中心任务,或者用现在的话来讲叫“第一要务”;国家统一则成为现代化过程中国家所要完成的另一个重要任务。现在,就完成这两个任务的基本条件而言,我们面临着中国崛起与国家统一外部环境之间相互关系的处理。

中国崛起与国家统一的关系: 时间因素

根据中国共产党十六大报告和国家领导人的重要讲话,从本世纪初到2050年,实现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是中国在21世纪的历史性任务。所

收稿日期: 2006 08 20

作者简介: 李义虎, 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 100000.

谓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实际上就是中国崛起的意思。这里面不仅有国家发展的战略目标设计,而且有国家发展进程的规划和时间的限定。这里所强调的,是完成中国崛起与实现国家统一两大目标的时间因素。实际上,崛起(rising)的概念与发展经济学中所谈到的起飞(take off)概念一样,同样是有时间因素的。按照著名经济学家罗斯托(W. H. Rostow)影响甚巨的起飞学说(the theory of take off),起飞是那些落后的国家或地区在相对短的时间内完成的从传统型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转型。如果要经历比较长的时间,比如说经历100年的时间,那么即使能够完成从传统型社会到现代化社会的转变,也不能叫起飞。而只有在相对短的时间里完成这种转变,才能称得上是起飞。在内涵上,崛起的概念与起飞的概念相比,有着相同之处,也有着不同之处。不同之处是崛起处在完成现代化的终点上,而起飞则处在走入现代化的起点上;换言之,崛起必须是完成全部起飞过程之后的事实。另一方面,崛起和起飞的相同之处是,二者都有严格的时间限制。只有在比较短的时间内,完成全部现代化的任务,才能算得上是真正的崛起。以此观之,2050年完成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这里面有严格的时间限定,能够在此时间内达成所设定的目标,应该算是作为发展中国家的中国的崛起。

同样值得注意的,是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目标的时间因素问题。在十六大报告中,这一问题也有充分的论述,并且在其序言部分它就被列为21世纪中国所要完成的三大历史性任务之一。^[1]这正好与实现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战略目标相一致,自然算是中华民族全面振兴的基本内容之一,也应该在时间指标上相当吻合。也就是说,中国的国家统一与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或崛起有着相当密切的关系,前者是后者的文中应有之义。如果设想到了2050年所谓中华民族的全面振兴实现了,或者说中国确实崛起了,但中国大陆与中国台湾仍然处于彼此分离的状态,那就不能算是真正意义上的中华民族全面振兴或者崛起。因为届时中国尽管在许多经济、社会指标上达到了21

世纪初所设定的战略目标,但如果中国连自己的国家统一问题都没有办法和能力解决,中国的现代化强国地位便很少有人予以承认,至少这种地位是要被打很多折扣的。就目前而言,虽然我们不可能像香港、澳门回归那样在天安门广场竖立一块倒计时的牌子,大家一块做倒计时的游戏,但中国的国家统一决不是没有时间概念的事情。这样说是因为:一是台湾问题的解决确实有其特殊的复杂性,因此,现在就圈定解决台湾问题的“确定时间表”,显然是不那么现实的;我们所说的解决台湾问题具有越来越强的迫切性,实际上是限于宏观的战略意义而言的。但是,另一方面,也应该强调,不硬性设定所谓“确定时间表”并不意味着无须强调时间因素,台湾问题的解决和实现国家完全统一的目标,仍然是有时间限制的,它至迟不能拖到中华民族实现全面振兴或崛起之后,最理想的情况是在20年机遇期内就完成,当然在条件具备时它还可以获得一种加速度。二是台湾问题的解决,即国家统一的最后完成,存在着更为复杂的外部环境制约,特别是需要面对中国崛起后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显著变化。在相当的意义上说,正是由于中国崛起和中国统一都被严格的时间条件所限制,所以它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会发生渐变,但更大的可能是发生突变;同时,它们面临的外部环境可能会发生有理性预期的变化,也可能会发生非理性预期的变化。这意味着,时间决定空间的逻辑张力,要求我们必须审视台湾问题解决和完成国家完全统一现在就具有的外部环境问题,也必须审视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变化问题。

中国崛起对国家统一外部环境的影响:新的空间因素

探讨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的著述甚多,这里所着重探讨的是中国崛起对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及其变化的影响。这样做,一是要以我为主地看待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二是要始终把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看成是一种必然存在着的动态过

程。

在论述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时,人们以往较多地以其他相关各方的因素作为考虑的重点,而较少以中国自己的因素作为观察指标。例如,不少人把美国因素或中美关系看成是国家统一外部环境中最大的制约因素。按照这种逻辑,在中国统一问题上,美国因素的重要性永远超过中国自己的因素。而实际上,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中国现在已经出现的崛起事实,说明它自己才是影响国家统一进程的最重要因素。中国是否能够崛起,不仅关乎中国自己的综合实力和地位如何,也关乎国家统一过程的进展和速度,还关乎到外部环境的变化。虽然从一个方面来讲,中国崛起是带有内部性质的问题,但从另一方面来讲,中国崛起也是一个会引起国家统一外部环境变化的直接的重要因素。这样说的道理很简单,因为中国的发展变化本身就是一种国际关系的结构性和格局性的变化,由于中国是与美国、欧盟和俄罗斯等实力档次相当的大国,它的任何发展变化对于国际关系来讲都具有一种显见的国家规模效益;也就是说,无论在地缘政治与地缘经济上,还是在国际格局方面,它的崛起都会随之引发一系列结构性的后果。自然,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目标的外部环境也会就此相应发生重大的、不可逆转的变化。虽然有人可能认为,中国的崛起尚处在进行之中,还没有达到完成崛起的终点,因此现在谈论中国崛起所带来的外部环境的变化问题,似乎为时尚早。虽然有人可能认为,中国现在采取的是维持国际社会现状的政策,并不直接挑战美国和西方自1945年以来所建立的国际秩序;所以,中国的崛起可能会带来中国实现国家统一时外部环境在某种程度上的变化,但不会带来实质性的巨大变化。虽然也有人可能认为,尽管中国走入了崛起的过程,但它实际上希望尽量避免出现过去曾经有过的“霸权国—挑战国”的循环模式,因而会跳出“大国兴衰”的周期性定律;其结果,由于中国的崛起不会重复出现过去那种因“霸权国—挑战国”相互关系变动或位置互换所引起的结构性震荡(包括大规模战争或世界性战争),所以根本不

会引起中国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的结构性变化。但是,这些认识存在着很大的偏差,甚至可以说没有充分理解到问题的实质。因为中国的崛起与欧盟的崛起、俄罗斯的复兴和美国可能发生的衰落一样,都是国际关系中的重大结构性变换,在影响全球力量的均势布局上具有同等的含义。虽然中国的崛起并不会像过去那样直接引发战争或其他类型的国际社会动荡,但中国已经发生的崛起事实在本质上是一种谁也无法回避的结构的变迁过程,必然会导致国际格局、地缘政治和世界经济的重大变化,其变化的性质和幅度还有可能超出现今人们的预期。特别是,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的地区环境,即东亚地区的环境,肯定会因中国的崛起发生秩序的改组等结构性的变化。因此,应该把中国崛起引发的外部环境变化视为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变化的关键性因素;也因此应该从纯粹观察外部环境的视角转移到以我为主的视角。这样做,并不是让中国人固守保守的内敛式或内向式思维,恰恰相反,它能够让中国人焕发出一种在国际关系中主动作为的建设性意识。

另外,中国的国家统一并不是一个静态的过程,而是一个始终处于动态的过程。正是由于中国的国家统一进程会始终伴随着中国正在发生崛起的事实,不仅中国社会的内部在发生着不间断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从改革开放以来国民经济的飞跃发展、人民生活的显著改善以及社会的巨大进步和政治文明发展的结果中,可以看得很清楚;而且它所面临的外部环境也在发生着不间断的动态变化过程,这从中国融入国际社会的速度、参与国际体系的能力和外部世界对中国的态度等方面,可以看得很清楚。^[2]尤其是,中国在崛起过程中的每一个阶段,都会累积着引起外部环境动态变化的因素。首先,在中国崛起过程中,中美关系这个影响国家统一的最大的、最重要的外部因素就会发生变化。中美关系会因为中国发生崛起的事实而被添加进一些值得注意的新因素,中美相互的位置关系有可能出现移动现象。按照购买力平价公式(PPP)的计算,在2026年左右,中国的GDP总值和国家经济总

量有可能接近或超过美国(即有可能成为第一大经济大国);即使按照贸易汇率的保守计算方法,中国也必然在这些方面接近美国或紧跟在美国其后(即肯定成为第二大经济大国)。由此,中国在国际政治上的影响将进一步扩大,对美国的制衡能力会大大提升,包括在台湾问题上对美牵制的作用也会随之提高。在复杂多变的国际局势中,为了更好地同中国打交道,美国有可能基于自己国家利益的考虑调整其对台政策,更愿意与中国一道共同遏制“台独”或至少不使台海局势失控。其次,中国的崛起还会使中国与其他相关大国的关系发生重要的变化。例如,中国与俄罗斯、欧盟的关系就有可能不仅在一种“多极化”的均衡中实现力量对比的转移,而且对它们来讲中国被借重的分量必将更大。在后冷战时期,面对美国推行“单极化”的战略企图,俄罗斯和欧盟都表示出了明确的反对立场,在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方面极力主张推行“多极化”和实现国际关系的民主化。在相当的程度上,可以说俄罗斯和欧盟在国际秩序上的基本立场与美国有着根本的不同,而与中国的立场颇为接近或相同。特别是,随着中国的崛起和综合国力的强大,它们都更希望借重中国的力量,希望中国发挥更大的建设性作用。而且,当中国与它们的力量对比更均衡时,它们都会愿意与中国一道共同构建新的国际秩序,推动建立和谐世界。至于说到台湾问题的解决,它们也都会倾向于承认中国的“自主能力”。再次,中国的崛起自然还会引起地区局势的改观。由于地理上近便的缘故,中国的崛起对东亚地区的影响更为直接,无论是在区域经济一体化领域还是在区域安全领域,中国都在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现在,崛起的中国已经成为区域经济发展的火车头,已经成为区域经济一体化和合作的重要动力,也已经成为区域安全问题领域的重要发言人。而在可以预见的未来,中国在进一步向前推进的崛起过程中,在实现崛起的结果之后,它在地区关系中所扮演的角色将无人能够替代。总之,上述几点都是使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目标的外部环境发生动态变化的所在,需要我们以动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当然,中国的崛起也

可能带来一些不利的外部环境变化,如“中国威胁论”有可能因此而加剧,其他大国有可能对中国增加更多的防范心理,并可能会采取相应的反制性措施。这种不利因素如果投射到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就会增加对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目标的阻力。但无论如何,这也需要我们以动态的观点和方法看待中国实现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

结束语

总结起来说,中国的崛起是一种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现实过程,不管是世界上的哪股力量,也不管是它们采取什么样的方式,都无法阻挡中国崛起目标的实现。由于中国具有一种“系统大国”^[3]的国家规模效益,所以,中国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的变化将主要取决于中国自己的发展状况及其结果。这种在历史上少有的情形,要求我们以我为主地看待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问题并采取相应的对策。

第一,我们应该继续坚定不移地把完成中国崛起放在首位,真正地把现代化建设作为“第一要务”来抓。从国家的总体战略上看,只有通过现代化建设完成中国崛起,才能迅速提高自己的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也才能为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奠定最重要的基础,提供最坚强有力的后盾。在这方面,需要妥善处理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与完成中国崛起的关系。应该看到,近年来台湾问题和两岸关系中常常出现动荡和不稳定的因素,特别是岛内“台独”分裂势力正在加紧推行“法理台独”的进程,使“一个中国”原则遭到严重的挑战;同时台湾问题的外部环境也仍然存在一些我们现在难于预期的变数。这些都使得解决台湾问题、实现国家统一与中国崛起相互间可能出现某种紧张的关系,特别是由于它们都是事关国家最高利益和核心利益的大事,所以这种紧张关系还有可能致使我们在个别关头面临两难选择的“决策困境”。一方面,中国崛起事关国家的命运和前途,要求我们始终牢牢把握住这个中心目标,须臾不能有所疏忽和偏离;另一方面,

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事关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要求我们在台湾岛内发生重大“台独”事变时决不能坐视不管。但是,尽管如此,我们仍然需要在二者的关系处置上保持战略上的高度稳健。胡锦涛的对台政策“四点讲话”和《反分裂国家法》把推动两岸关系的和平发展和遏制“台独”逆流当作当务之急,正是妥善和合理处理二者关系的重要举措;按照这种对台政策的新思维,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也被纳入了中国崛起进程的整体考虑,中国崛起的进程将为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提供更加有力的保障。

第二,我们要把解决台湾问题的努力放在依靠自己力量的基点上,而不是单方面寄希望于外部势力的“善意”。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是中国的内政问题,并不需要借助外部势力的帮忙,这是中国政府和中国人民的一贯立场和态度。虽然这个问题也存在一些外部因素,也需要我们妥善和合理地对待这些因素,但解决它的基点只能是依靠自己的力量,并且依靠自己的努力。人们知道,美国因素是台湾问题上最大的外部因素,美国政府对台湾问题的产生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这也是中国方面一再强调台湾问题是中美关系中的核心问题和症结所在的基本原因。但是,中国所要求的是美国应该对台湾问题负起必要的责任,而不是希望它对台湾问题指手画脚。近年来,一方面,美国政府对台军售问题上一再干涉中国内政,并多次向台湾当局发出错误的信号;另一方面,它也多次表示反对“台独”和旨在推动“法理台独”的公投活动。自2003年9月以来,在陈水扁当局加快推动“台独”步伐的情况下,美国政府还对其放出重话和狠话,并明确表示反对引起台海局势不稳定和单方面改变现状的做法。这就是人们所说的近期形成了中美联手共同遏制“台独”的局面。但是,尽管如此,美国方面所采取的对台政策是基于它自己的国家利益和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利益,而不是纯粹对中国的“善意”。因此,解决台湾问题和实现国家统一,寄希望于美国的某种表态只能是一种不切实际的幻想。相反,中国需要不断加强自己在处理台湾问题上的地位,

需要通过以我为主地调整对台政策来持续地增强控制和引导两岸关系发展方向的能力和实力。而中国的崛起和综合国力的提高将必然会为此营造最基本的条件。

第三,中国需要善处自己崛起的国际政治后果,在实现国家统一的过程中,更应该如此。正如就根本意义来说事物都具有两面性一样,中国已经发生的崛起过程及其未来结果,对中国的国家统一肯定会带来许多无法回避的十分正面的和有利的影 响,但也自然会存在着与之相伴随的一些负面的和不那么有利的影 响。中国的崛起意味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地位的提高,因而自然会增强中国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国家统一目标的能力和实力,自然会在更大程度上吸引台湾广大民众对国家统一的认同感,也自然会有更大可能排除外部势力的干扰。如果中国在自己的崛起过程中,能够善处自己崛起的国际政治后果,特别是能够与其他大国(包括美国)善处关系^[4],那么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就会出现十分有利的前景,至少这种外部环境和条件会在相当的程度上得到改善。但是,另一方面,如果在中国崛起的过程中,中国不能善处自己崛起的国际政治后果,与其他大国特别是美国的关系不能善处,则国家统一的外部环境和条件就会出现不利的一面。因此,从现在起,中国应该制定出适当的国家崛起战略和国家统一战略,并使二者具有良性的“必要的张力”和互动关系。

注释:

[1] 江泽民. 全面建设小康社会,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事业新局面. 中国共产党第十六次全国代表大会文件汇编. 人民出版社,2002:2

[2] 时殷弘. 中国崛起的条件:从对外关系角度的讨论.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1)

[3] 肯尼思·沃尔兹(Kenneth Waltz)语。

[4] 钮汉章. 相容:超越零和的有序竞争——政治发展视角下的21世纪大国关系走势. 世界经济与政治论坛,2006(1)

(责任编辑:徐冬青)